

严济慈与许德珩：

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严慧英



殊途同归，相识于巴黎

九三学社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合影。前排左四许德珩、左二严济慈。

1990年2月8日，许先生以百岁之寿辞世。当天傍晚，严济慈从电话中得知消息，“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己”，不愿年近90岁的高龄，连夜挥毫，含泪写下《深切悼念德珩同志》。

从悼文中我们得知，两位老人1923年于法国巴黎“在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目标下相识并结为朋友”，而后相知相助、携手并肩，一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在北京大学，他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许德珩是五四运动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受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1920年，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先就读于里昂大学，后入巴黎大学。

我的爷爷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923年10月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他结识了许德珩，二人一见如故，相知甚欢。

这有些奇妙。论年龄，严济慈比许德珩小十岁有余，可谓忘年之交。论资历，严济慈是个单纯的留学生，从东南大学毕业即负责巴黎，从一个校门走进另一个校门，毫无社会经验；而许德珩赴巴黎之前已出生入死，为匡扶社稷、救国救民多有贡献，享有赫赫声名。论专业，严济慈学的是物理学，许德珩学的是社会学；一个理科，一个文科，学业上也无交集。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挚友，且保持友情半个多世纪。

早在1919年，严济慈还是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时，五四运动爆发，南京高师的学生立即响应，走上街头，予以声援。那是严济慈生平第一次参加爱国救亡游行。在活动中，他知道了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名字和事迹，其中就有许德珩。严济慈对许德珩仰慕已久，而今有幸相识，自然是一见如故。严济慈到巴黎大学还没有开始上课，仅在补习法文口语期间考取了一张数学文凭，在中国留学生中也是声名大噪，加之他八九岁就在南京参加了爱国救亡活动，当然也令许德珩青睐有加。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很自然就在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目标下相识并结为朋友了”。（《深切悼念德珩同志》）

此后，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不仅在九三学社携手共进，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也互相关注，各有成就。许德珩不仅是著名政治活动家、革命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著名社会学家。他在巴黎学的是社会学，在哲学、社会学领域多有著述。代表作有译著《社会学方法论》《哲学的贫困》《唯物史观社会学》《家族进化论》、著作《社会学概论》和《社会学讲话》等，在我国学术史尤其是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巴黎期间，他把法国著名学者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翻译成了中文。蔡元培对昔日的北大弟子许德珩刻苦勤奋、严谨治学的行为十分赞赏，亲自为其校阅译稿，并撰写序言。蔡元培认为这是“近年来最有价值的译本”，并将译稿推荐给自己在上海的同乡好友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社会学方法论》于1925年出版，后多次重印，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影响很大。

严济慈是物理学家、教育家，他在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领域多有建树。一生发表了53篇科学论文和100多篇篇文章，出版有《初中算术》《几何证题法》《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理化》《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电磁学》《居里和居里夫人》等十多本专著。其中《初中算术》《几何证题法》也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反复重印，在数学基础教育领域影响很大。

婚礼致辞，从爱字说起

1925年4月21日，严济慈在给未

婚妻张宗英的信中汇报：“上星期一（按：4月13日）接许君德珩与劳君荣（君展）女士结婚请帖……星期四（按：4月16日）下午行礼于中国饭店之万花酒楼，他们强我演说，好像作为科学家的代表……”（《法兰西情书》第265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一个星期后，4月28日又写信说：“上星期六晚，许德珩夫妇来访，或作拜谢贺客之意。”（《法兰西情书》第267页）从这两封信中可知，许德珩与劳君展于1925年4月16日（星期四）结婚，婚礼在巴黎的中国饭店之万花酒楼举行，严济慈作为科学家的代表在婚礼上发言致贺。

婚礼过后，新郎新娘亲自登门拜谢好友宾客。严济慈在婚礼上的发言致贺很别致，他从对“爱”（爱）字的分析讲起。他说，“爱”字是“受”字头，“友”字尾，中间一个“心”字。“受”字头，表示结婚是人生受用的开始；“友”字尾，表示结婚是友谊的尾声；中间这个“心”字，表示两个人爱在心中。（见《深切悼念德珩同志》）严济慈作为一个攻读物理学的理科生，这番“说文解字”般的致辞是不是很有“文艺”？要知道，婚礼现场的嘉宾不仅有画家徐悲鸿，还有大语言学家刘半农。在一众文豪面前，严济慈这个理科生展示出了自己的文科才华。当然，更确切地说，他展示的是自己对爱情的深刻理解。

许德珩与劳君展的爱情是传奇的，是令人艳羡的。许德珩少年成名，建功无数，自不必多言；劳君展也是著名才女，1900年出生在长沙一个富裕人家。18岁时，她考进赫赫有名的长沙

周南女中，跟女革命家蔡畅成为同学。在周南女中，劳君展担任了长沙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长，参与了毛泽东等人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还在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组织社会活动，走上街头发表演说。一时间，名满长沙。

1921年初，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到欧洲考察教育。在巴黎，他将同行的女学生劳君展介绍给曾经的弟子许德珩相识，并请托许德珩为将留在法国上学的劳君展补习法文。也许蔡校长是以“补习”为借口，有意为自己的弟子撮合美事吧。那时候的许德珩因为劳君展早逝，自号“楚僧”，表示要像佛门弟子一样不再娶妻，孑立一生。然而，惜才且智慧的蔡校长，岂能任由才子拒佳人以千里？巧妙的一个“补习”，把许德珩和劳君展拉到了一起。

许、劳二人补习法文之余，还多有书信交流。有一天，劳君展将许德珩来信的落款署名“楚僧”改为“楚生”。才子自然读懂了佳人的心思，也动了凡心。就这样，他们由“补习”而相处、相知，终而爱心同结。相识5年后，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作为新郎的好友，严济慈当然知道许德珩与劳君展两人的爱情传奇。婚礼上的致贺从解析“爱”字说起，再恰切不过了。严济慈说，两位的结合全凭一个“爱”字，他们俩“从友谊到心心相印，合两心为一，真挚的爱情使他们受用终身”。严济慈还评论道：“他们两位都是爱国志士，伉俪之爱和对祖国之爱是永远不可分的。”（见《深切悼念德珩同志》）

（本文为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严济慈之孙女）

瞿秋白为广州起义正名

周二中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广州起义。在这次起义激烈的炮火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但终因起义力量众寡悬殊，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起义失败。

广州起义不久，瞿秋白就写了两篇文章对起义工农兵士和张太雷进行哀悼，分别是《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和《悼张太雷同志》。在《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中，瞿秋白指出：“这些工农友友以及革命的兵士，为拥护广州的苏维埃政府而死了，为拥护自己的政权而死了。但是，无论反革命派如何残杀，我们工农兵士的革命意志，是始终坚决的。我们号召全中国三万万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积极诚恳地致敬礼于革命的先锋——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人的工农兵士，并且继续他们英勇的精神起来奋斗，不达到解放的目的，誓不中止！”在《悼张太雷同志》中，瞿秋白对张太雷这位同乡（他们都是江苏常州人）和同志的牺牲给了

高度评价：“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得对于中国工农农民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然而，不久即有人对广州起义的发动、作用等提出了质疑。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当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时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国共产党员佩佩尔认为广州起义是盲目的、冒险的。瞿秋白与佩佩尔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瞿秋白指出，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广州起义具有社会基础，带有群众性，发动起义是正确的。广州工人自己提出的一个口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广州起义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革命的新时期，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期。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

梁漱溟与熊十力的别异相识

杨建民

梁漱溟与熊十力两位学者，个性都颇为突出。他们的相识，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佛学，熊十力早年是排斥的。他的部分意见看法，以札记的方式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正在研究佛学的梁漱溟，读到这篇文章，很不以为然。当时他正在写作一篇后来产生相当影响的长文《究元论佛学》，此文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理论，而独自推崇佛法。其中针对熊十力所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的言论，给予了驳斥。他的驳斥，不但直举名姓，言辞也很不客气；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说一个学者“愚昧无知”，可被认作骂人。熊十力原名继智，又名升恒。他发表排斥佛学的札记，用的是“熊升恒”这个名字。

梁漱溟这篇《究元论佛学》刊发在当时有名的《东方杂志》上。蔡元

培读到后，认为水准足够，随即邀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当时梁不过24岁，以一篇文章入教北大，那时期用人的不拘一格，于此可见一斑。

到北大任教不久，梁漱溟接到天津寄来的一封信。上面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读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大致可以接受，希望有机会晤面好好谈谈。寄明信片的人，便是此时在南开中学的熊十力。不久，熊十力利用假期来到北京，借居在广济寺。这样，他与梁漱溟“遂得把握谈……”这是他们彼此结交端始。

学人之间见面交谈，自然多在学问。据梁漱溟回忆：“一入手便是讨论佛氏之教。”讨论的初步结果，熊十力接受了梁漱溟的建议：开始研究佛学。可后来的事实，是熊十力研究的结果，自我推陈而“出新”，更加坚持自己原有观念，这让梁漱溟很无奈。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丰子恺三绘《漫画阿Q正传》

崔鹤同

鲁迅曾于1924年4月至10月，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交未名社并于该年12月出版。巧合的是，丰子恺也翻译了同一本书，并于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件事使年轻的丰子恺深感不安，特意登门拜见鲁迅，满怀歉意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这有什么关系，在外国，一本书可以有几种译本同时存在，以取此之长，补彼之短。”鲁迅谦和与雅量，使丰子恺由此更加敬重。

此后，丰子恺一直关注鲁迅，他认真阅读鲁迅的小说，并考虑着手以漫画的形式“再现”鲁迅小说。1937年春，丰子恺就以鲁迅小说《阿Q正传》为画材作漫画54幅，交由原上海南市某印刷厂印刷，不料遭日寇轰炸，原稿全部付之一炬。1938年春，学生钱君匋替《文丛》期刊向丰子恺要《漫画阿Q正传》。《文丛》是靳以和巴金于1937年3月15日在上海创办的大型文学刊物。丰子恺便又重画，并陆续寄《文丛》发

表。他先寄了两幅，后又寄了6幅。可惜《文丛》刚发表了两幅，就遇上了日军在广州的大轰炸，余下的6幅葬于火海。

无情的战火两次毁掉了丰子恺的画作，丰子恺却说：“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得，亡者必可复兴。”怀揣如此信念，他于1939年3月，第三次创作《漫画阿Q正传》，并且很快完成。这次他没有立即拿去发表，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家乡与鲁迅的故乡绍兴，虽然相距不过二三百里，但在风物民情方面却略有差异。本着对艺术、对读者，也对鲁迅负责的态度，他特意请教了张祥生、章雪山两位绍兴籍的朋友，对这些画提了一些意见，擅长绘画的章雪山还为丰子恺画了一只乌篷船。丰子恺又对画作全部校改一遍，囑女儿把这54幅画逐一印摹一套以防再遇不测。1939年7月，第三次获得新生的《漫画阿Q正传》，终于由开明书店出版，实现了丰子恺想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的心愿。此画集后来一共再版15次，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吴冠中“毁印”

王剑

吴冠中是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他在画艺上精益求精，在做上效仿鲁迅，佳话频传。其中最有个性的故事，莫过于“烧藏画”和“磨印章”了。

吴冠中的画作是艺术市场的“宠儿”，辉煌纪录不胜枚举：《周庄》以约合1.97亿元人民币成交；《狮子林》以1.15亿元成交；《长江万里图》以1.495亿元成交；《荷塘》以1.062亿港元成交……

虽然画作频频拍出天价，吴冠中的生活却极朴素。他娶妻于方在北京南后街小区的一套百十平米的房子，没有装修，仍旧是水泥地板、木制的窗框窗格子，一应的原生态。画室之小，堪比斗室。他喜欢吃楼下店门的天津煎饼，到收费三五元的小店理发。你很难想象，他的画作就是从这间普普通通的住房走出，进入国际画廊的。

1991年，时年72岁的吴冠中在整理家中藏画时，将不满意的200多幅作品全部毁掉。此前，他就曾把自己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全部烧掉。他

的毁画举动，被海外人士称为“烧豪华房子”。吴冠中说：“作品表达不好一定要毁，古有‘毁画三千’的说法，我认为还是少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保留让明天的行家挑不出毛病的画作。

晚年的吴冠中，由于健康的原因，不能再继续提笔作画了。国内某知名美术馆的馆长带着一份厚礼来拜访他，想高价收购吴冠中的一枚印章，带回去给美术馆作为“镇馆之宝”。吴冠中当即拒绝说：“我都不画了，印章已无任何价值，不必再馆藏了。”

此后的一天，吴冠中和妻子坐在楼下草坪边的水泥台上，打开红布包儿，取出好几枚精致的印章，一起在地上磨。卖煎饼的妇女走过去问：“你们这是做什么？”他说：“把我的名字磨掉。”妇女不解地问：“好好的印章为什么要毁掉？”他说：“不画了，用不着了，谁也别想拿去乱盖，制造赝品。”

在吴冠中看来，艺术家就应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他毁掉印章的举动，可谓惊世骇俗，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一滴汽油一滴血

——孙越崎的实业救国之路

杨耀健

抗战爆发后，油轮受阻，大后方闹油荒，影响作战及生产，国民政府提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加紧开发油矿。

开发玉门油矿

1938年，民国政府经济部决定开发甘肃玉门油矿，但当时仅有的2台先进钻机此前已被安置在延长县，而此时延长县已被红军占领。汉口撤退前，经济部长翁文灏与周恩来协商索要钻机，周恩来从抗战大局出发，表示赞同，并派钱之光具体办理。

1939年春，在玉门油矿老君庙打出第一口油井，日产原油10吨。1941年成立甘肃油矿局，驻重庆办公。委任能源专家孙越崎为总经理，严爽为油矿矿长，金开英为炼油厂厂长。

玉门油矿所需水泵、油泵、炼油釜、阀门、管件等设备配件，全部从重庆订购，连同由沦陷区拆迁来的和由重庆江北自来水厂拆卸的钢板、管子、马达等，经长途车运到矿区。油矿职工苦干数月，自行设计制造了24座釜式炼油炉。打井用的水泥只有重庆一家生产，打井用的重晶石来自干涸地

区。甘肃油矿局自设运输处于歌乐山，自重庆至玉门沿途设了十多个车站，将各种器材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玉门。

孙越崎每年夏秋常驻玉门督促生产，冬春在重庆筹划财务预算及器材的搜购转运，并兼顾四川各煤矿的产销工作。

创业艰难

玉门油矿位于戈壁滩，土壤含沙量大多，不能烧砖瓦，唯有采用“干搭窑”的方法，将屋顶筑成拱形，上盖沙土拌油渣，以避雨雪。后来从外地拉土到矿区烧砖瓦，方可建造楼房。半年的冰雪期，取暖做饭，仰仗祁连山山里的小煤窑。炼油剩下的重油和油渣，没有裂化设备再提炼，也被利用来做燃料。粮食来自数百里外的张掖、武威、山丹等地产的麦子，到手后还须经过面粉厂加工后才能入口。工人穿的老羊皮袄，容易生虱子，又痒又疼。矿上建起蒸汽浴室，把老羊皮袄挂在屋内，以高温杀灭虱子。

1942年，矿区员工达到6800余人，连同家属多达数万人，吃喝拉撒很伤脑筋。矿上只得自办供销社、百货公司和食品商场，从重庆等城市拉来布匹、衣服、鞋帽、文具和干鲜水果等。又在玉门县办蔬菜农场，并自制酱油和醋。

开发资源人才是关键，能否留住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西北工学院招聘的几百名大学生，婚姻是个重要因素。孙越崎与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相识，后者在重庆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他就委托邵夫人在该校挑选一批肯吃苦耐劳、有志边疆建设的女学生送到矿上，安排担任教员、护士、财会和其他管理及文牍工作。这样一来，矿区气氛活跃，大学生都在这里成家立业，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国石油工业战线的许多专家，大多是从玉门油矿起步的，大名鼎鼎的“铁人”王进喜也出自于玉门。

万里运油

玉门油矿的产品，除部分供应西北公路局等单位外，主要销往重庆和大后方。1940年，炼油能力提高到1500吨，储运能力却远不能适应。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贫弱的中国连贮油罐也无法制造，战前进口的2个贮油罐，转眼间就已装满，车队一时不来拉油，炼油厂就要停工。一方面，前方的战车舰船缺油告急；另一方面，玉门油矿有油运不出来。

孙越崎心如火焚，他借蒋介石到玉门油矿视察之机，请求拨给油矿6万个200公升的空油桶贮油，蒋介石即令后

勤司令部拨运了3万个。这些空油桶虽十分破旧，但经检修后大部分能用，炼油厂可以日夜三班连续生产了。油矿又新规定来提油的单位自带空油桶，矿上以装满油的油桶交换，用户称便，一举两得。

但那时没有铁路，从玉门到重庆往返5000公里，全靠几百辆汽车运油，路况车况不佳，运油车本身消耗油料极大。为节约，油矿局将黄河上使用的羊皮筏子搬到嘉陵江上用作运输工具。汽油从兰新公路运到四川广元，改用羊皮筏子装载顺水漂流，直达重庆，这样可减少约800公里路程。羊皮筏子与空油桶一道运回广元，重复应用。至今，满江羊皮筏子漂洋，成为老重庆人茶余饭后的新鲜话题。

立功受奖

1943年，针对国民党政府中某些人不相信能长期开采石油，提议停止对玉门油矿拨款时，孙越崎提出年产180万加仑汽油的要求。他逐一审查计划，落实措施，发动员工。到当年岁尾，奋斗目标终成现实，炼油厂、电厂的汽笛齐鸣，人们将他抬着在矿区内欢呼游行，一直抬到露天剧场的戏台上。

国产汽油大力支援了抗战。1943年日军强渡风陵渡，企图入侵陕西省。玉门油矿就近供应油料，使中国军队增加运力，及时将苏联援华的火炮拉到前线，阻遏了敌人的进攻。1944年，美军远程轰炸机“空中堡垒”以成都太平寺机场为基地，多次轰炸日军占领区和东京，其地勤用油使用的也是玉门油矿产品。

因开发玉门油矿卓著勋劳，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孙越崎被授予金质奖章。（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